



0012296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元明清

巴蜀书社

译注 王火青

审阅 周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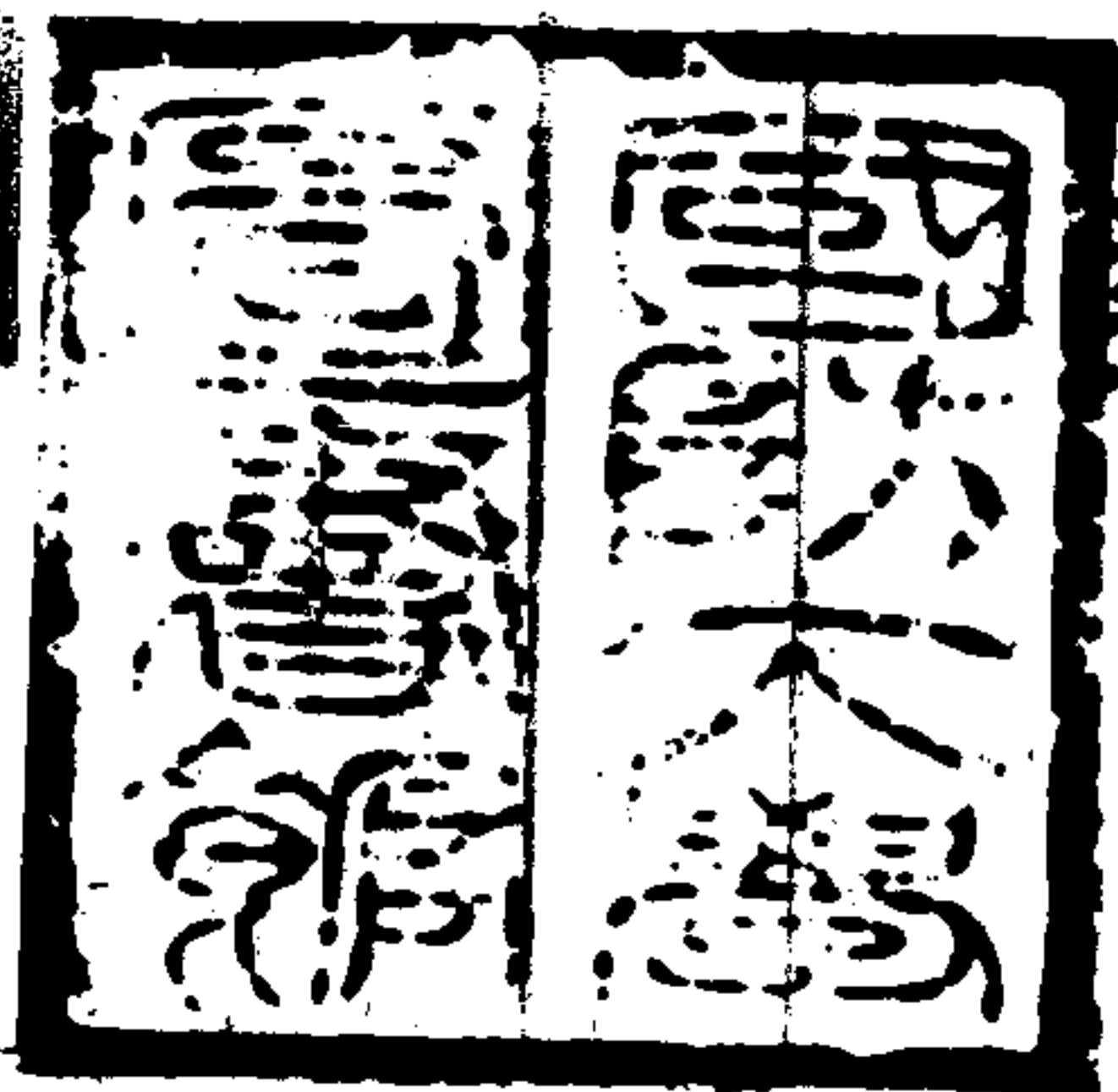
清代文言
小说选译

67118-120



2 031 0329 3

清代文言小說選評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李 嘉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清代文言小说选译

王火青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0.875 插页2 字数175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 元(第二批50种)

10/03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我国文言小说源远流长。远古的神话传说，先秦两汉的寓言故事史传文学，为小说的孕育和诞生作了准备。魏晋南北朝是小说发展的童年时期，出现了记述神鬼怪异的“志怪”小说和品评人物言谈举止的“轶事”小说。这种笔记体小说大都篇幅短小，内容零碎，只有简单的情节和粗略的人物描写。作家只是据闻而录，并非有意识地在写小说，所以还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小说。

到了唐代，小说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的作家开始了有意识的小说创作，创造了一种以人物为主的传奇体小说。这种小说篇幅漫长，容量较大，可以表现一个人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的经历。它立意新奇，情节曲折，形象鲜明，文字优

美，广泛反映了唐代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斗争和各色人物的生活情态。唐传奇的出色成就，促成了文言小说创作的第一次高涨，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已经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进入了成熟阶段。

宋代小说的主要成就是崛起于市井之间的白话小说——话本，而不是文言小说。因为宋传奇大都取材于历史，很少反映现实生活，加上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作品多含教训意味。艺术上走了一条拟古的路子，缺少创新精神。宋志怪也大都平实简率，缺乏文采。至于以人物轶事为主的大量笔记小说，虽可补史传之阙，但和真正的小说艺术还存在着距离。

元、明两代，文言小说也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因为元代文人的心力主要集中在散曲、杂剧等方面，较少涉笔文言小说。明代前期思想禁锢较严，小说创作受到了抑制。明初瞿佑的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虽曾风靡一时，但此后的仿作如李桢的《剪灯余话》、陶辅的《花影集》等，却遭到了非难、禁止。直到嘉靖之后，白话小说以其辉煌成就，成为文学的主流，文言小说创作才开始出现了转机。万历之后，文人纷纷撰写和编辑文言小说，书坊也竞相刊刻各种唐传奇的选本以牟利，于是传奇风韵，又一次弥漫于明末清初文坛。这就为清代文言小说创作的新高涨准备了条件。

清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前期，从顺治初年到康熙末年（1644—1722），是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也是文言小说取得突破性成就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张潮选编的《虞初新志》和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的问世。

清代初年，文坛上学唐人小说的风气很盛，不少知名作家象钱谦益、王猷定、李清、陈鼎、吴伟业、黄周星、李渔、余怀、侯方域、魏禧、毛奇龄、陆次云、王士禛、邵长蘅等，都积极参加了传奇小说的写作，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创作群体。这群作家成功地将史传文学和传奇小说结合起来，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人物传记小说。他们往往撷取明清之际社会大变动中的一些奇人、奇事、奇行、奇技作为描写对象，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以艺术增饰，较深广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些小说在艺术上的共同特点是，选材新奇而真实，笔法简练，章法谨严，善于通过提炼典型情节和典型细节突出人物性格。它虽不象唐传奇那样委曲详尽，文采华赡，但形象鲜明，蕴藉隽永，可感性强，可以看作传奇小说的一种新品类。这些小说由于思想艺术上的成功，当时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注目。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张潮从清初各名家文集

和说部书中精选汇录，终于将这些分散的小说结集成《虞初新志》刊刻行世；以后张潮又不断增订，大约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才成定本。《虞初新志》主要以人物传记为主，它入选的标准是：“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核，文隽而工，写照传神，仿摹毕肖。”^①强调选材的真实性，把人物塑造作为小说构思的中心环节，这反映了选者进步的小说观。《虞初新志》刊行后，曾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并远播到日本等国。嘉庆年间郑澍若编的《虞初续志》（1802年刊行），黄承增编的《广虞初新志》（1803年刊行），都是仿《虞初新志》体例从顺、康、雍、乾各名家文集和说部中披览选录的。

如果说，《虞初新志》所选的小说显示了史传体传奇小说的成就，那么蒲松龄（1640—1715）《聊斋志异》的最大功绩，就是把传奇小说和志怪小说结合起来，开创了文言小说的另一种新品类——传奇体的志怪小说。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②，把写人的方法引入志怪小说之中，“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③这种真幻交织、虚实相

^①张潮《虞初新志·自叙》。^{②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生的艺术方法，极大地开拓了作家自由驰骋的天地，给文言小说创作带来了蓬勃生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孤愤之书”^①，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灌注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作者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生活的土壤之中，他以独有的文心，选取超现实的谈狐说鬼的形式观照现实，寄托真情，在小说中极力追求一种真中见幻、幻中见美的艺术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在艺术上孜孜追求，自觉地把握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充分发挥自己的独创性。他的小说在表现主题、刻画人物、谋篇布局、运用语言诸方面都表现了极高的写作技巧，艺术上达到完美的程度，常使人百读不厌。蒲松龄以毕生心血浇灌了《聊斋志异》，将文言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小说代表了我国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对有清一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钮琇（？——1704）的小说集《觚觿》也是一部优秀之作。此书以纪实的笔记小说为主，但也收有一些传奇佳篇。小说对明清之交的社会变迁和重大政治事件多所反映，艺术水平也较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评曰：“琇本好为俚偶之词，故叙述是编，幽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

^①蒲松龄《聊斋自志》。

遗。”此外，象王士禛的《池北偶谈》，以纪历史琐闻为主，间收“谈异”之作；王晫的《今世说》，仿《世说新语》体例，记顺、康间文士的言行，在笔记小说中均属上乘之作。

中期，从雍正初年到嘉庆末年（1723—1820），是文言小说的繁盛期，也是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家竞相发展的时期。

雍正及乾隆前期，由于文网严密，文言小说创作的势头受到了遏制，曾一度趋于沉寂。但一些作家并没有中止自己的创作，他们仍然在孕育着新的产品。到了乾隆中期，文言小说开始走向兴旺，一个新的创作热潮正在逐步形成。从乾隆中期到嘉庆时，文言小说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许多作家竞相创作，争奇斗妍，各种类型的小说集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传奇小说和笔记小说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这些都显示了这一时期文言小说创作的实绩。

从传奇小说创作来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其生前死后，虽一度以抄本流传，但流传的范围终究有限。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鲍廷博的《青柯亭刻本》刊行后，《聊斋志异》才得到广泛流传，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这之后，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纷纷问世，其中成就较高的有

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沈起凤的《谐铎》、曾衍东的《小豆棚》等。

满族作家浩歌子，据考即乾隆时大学士尹继善之第六子尹庆兰(1735?—1788)^①。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作家，工诗文绘画，在当时颇有文名，以秀才终身。他的《萤窗异草》以狐鬼异闻为描写对象，在题材、情节、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刻意模仿《聊斋》，颇能得其神貌，有“聊斋剩稿”之誉。但他毕竟是贵族公子，缺少蒲松龄那种孤愤之气，对社会疮痍的感受不那么深切；语言也带有明显的辞章化倾向。《萤窗异草》也有可取之处，其中一些优秀篇章揭露腐败政治和丑恶现象，颂扬清官能吏，赞美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常为人们所称道。小说笔触细腻，想象丰富，情节跌宕起伏，长于通过对话表现人物的心态情愫，主观抒情性强，极富于感染力。

另一满族作家和邦额(1736—?)，年轻时曾在西北陕、甘、青地区和东南福建一带生活过，后就读于北京八旗子弟的咸安官学，出任过县令。他的生活阅历丰富，见闻广博，对当时社会和底层生活有比较真切的认识，加上喜欢搜求新奇希异的志怪

^①见《八旗艺文编目》子部稗说《萤窗异草》原注：“满洲庆兰著。庆兰字似邨，庠生，尹文端公子。”

故事，艺术修养也比较高，这就为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夜谭随录》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作者“颇持直笔，无所隐讳”^①，敢于直面当时的现实，揭露社会的溃瘍，对乾隆“盛世”政治的黑暗，经济的萧索，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八旗世家的没落命运，都有所触及，预示了这个社会已经走向衰败。小说取材广泛，涉及的地域相当辽阔，像反映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生活，描写各地奇风异俗，特别是朔方景物的篇章，都别开生面。小说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明净流利，表现力极强。作者善于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体察人情世态，用白描手法描写人物，人物的语言充分生活化、性格化。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

沈起凤（1741—？）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的诗文、戏曲、小说都知名于时，而以“《谐铎》一书最播人口，几妇孺皆知。”^②《谐铎》结集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此书对乾隆时的官场、科场颇多针砭，在揭露和讽刺社会生活的丑恶现象方面，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小说熔情、理、趣于一炉，寓劝戒于嬉戏笑谈之中，给人以一种谐趣美的审美享受。小说构思精巧别致，内涵丰富。但过于

^①蒋瑞藻《花朝生笔记》，见《小说考证》续编卷一。 ^②吴梅《萸渔四种曲跋》。

追求劝惩的目的，有时不免流于穿凿，失之浅露。

曾衍东（1750—1815？）生活于乾隆中叶至嘉庆中叶，正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时期。他的《小豆棚》在创作倾向上追踪《聊斋志异》，是一部“愤世”之书^①。小说明显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深刻变化，艺术地再现了当时政治糜烂、道德沉沦、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情景。小说对下层人民的美好品德和普通妇人的智慧才干由衷地赞美，体现出作者的进步倾向。小说在塑造人物时，注意截取生活场景的一个横断面来展示人物性格；注意选择典型事件多侧面地刻画人物；注意吸收群众口头语言，在人物对话中显现性格。这是他的一些作品获得成功的原因。《小豆棚》也有败笔，一些作品荒诞、污秽，情趣不高；人物形象苍白、概念化，情节雷同，这些都影响了小说的价值。

除以上四部小说外，象乾隆末年刊行的乐钧的《耳食录》，嘉庆间刊行的冯起凤的《昔柳摭谈》等，虽尚有可观之作，但已乏于描绘，趋向质朴简约，在格局上几接近于笔记体小说。

总的看来，上面几位作家的小说集，虽然在写法上都取法于《聊斋》，体裁上没有新的突破，思

^①曾衍东《小豆棚·述意》。

想上和艺术上也没有达到《聊斋志异》的水平，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各自的特殊生活经历，他们创作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对清代文言小说的发展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应抹煞的。

这一时期，笔记小说很多，其代表作就是袁枚的《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袁枚（1716—1797）为乾隆后期诗坛盟主，以性灵说独树一帜。他的《子不语》二十四卷，刊刻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续编十卷，刊刻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这是一部笔记体的志怪小说集，专记鬼神怪异之事。书中对吏治腐败、世风浇薄的社会现状多所揭露和讽刺；对扼杀人性的程朱理学和束缚才智的八股时文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一些不怕鬼的故事，也能引人入胜。小说文笔简洁，自然流畅，隽永有味；但过于率意，亦多芜秽之作。此书在当时享有盛名，影响很大。

纪昀（1724—1805）是乾隆时有名学者，任《（四库全书）》总纂官。《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是他晚年遣兴之作，分别刊刻于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三年（1789—1798），嘉庆五年（1800）始合刊。纪昀的文学观比较保守，不懂得小说的审美特性，他